

# 阳明心学、南大吉与关中儒学之交涉

耿峰

陕西省渭南市瑞泉中学

**摘要：**关学为北宋时期关中大儒张载所创，与廉学、洛学、闽学几可并立。然而，这样一个较大规模的学派，在张载之后却日趋凋零。明代中叶，关中学者与其他地域交流互动，逐渐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理学家，以王承裕、马理、南大吉、韩邦奇、杨爵等为代表，关学遂出现了兴盛的局面。阳明学对关学的再度兴起有重大影响。南大吉对心学西传做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阳明心学；南大吉；关学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3.04.115

## 引言

南大吉，明代关中著名儒学家，陕西渭南人，1511中进士。1523，南大吉任浙江绍兴知府，当时王守仁正在浙江传播其心学思想，影响颇大，南大吉受教于其门下。南大吉与其弟南逢吉曾共同师从王阳明。南大吉跟随王阳明学习心学思想后，因实践有得，遂相信圣贤自在人心，不比他求，其后一生即服膺于阳明之教。1524年（嘉靖三年），南大吉修葺稽山书院，选优秀学生入书院读书，并请王阳明及其门人讲学其中，《绍兴府志》说：“文成振绝学于一时，四方云集，庖廩相继，皆大吉左右之。”后来，南大吉又刻《传习录》于越。这些举措，可以说为当时王学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1526年，南大吉因得罪地方大族而被罢官归乡。阳明对南大吉大为称赞说：关中自古多贤达之士，其忠信沉毅的气质，英伟明达器宇轩昂，四方之士，我的见识也算宽广，但从未见到如关中人才如此兴盛的。然而自张载之后，关学萧条，或者和其他地方的儒学一样没有特色。从现在开始，关中的士人奋发有为，促进其学术道德之发展，一心向圣贤学习，南大吉和南逢吉功不可没。

阳明书信中寄予南氏兄弟极高的期待，他期望于南大吉兄弟能够在其家乡传播良知之学，使关中之士能够奋发有为，使其学术以道德为旨归，在气节和胸襟上以圣贤为目标。不久之后，王阳明阳明又复信询问南大吉，家乡英俊之才从事圣贤之学的人有几何，关学断绝几百年，当今之人如果将才智用于此，像空谷足音一样，大家都是豪杰。南大吉就自己临政多过一事求问于其先生王阳明为何不曾有一次出言纠正自己，且在阳明反问其有何过错后，他更是历数自己的过错而毫不手软。待阳明引导其认识到“良知自知之”并进一步引出“良知独非我言乎”时，南大吉终是明白故笑谢而去。其实，这里涉及了两个问题，即“良知”的由来和发用。具体而言，首先，便是“良知”乃自家体悟而得，

并非从身外拾得或是从旁人那里寻得故而阳明不言南大吉之过而南大吉由是自知。然后，便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人作为“良知”发用承载者的主体性问题，即“良知”的发用乃是个体自身主动通过“良知”作用于万事万物从而辨别是非功过，故而阳明将“良知”复归入每个个体，只言其真，从而强调每个个体的主动自觉。

## 一、阳明心学之梗概

王阳明是明代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对当时的中国和东亚儒学产生了极大影响。王阳明的思想在整体上是对程朱之学的深刻反思，他倡导的心学复兴运动，具有时代的意义。其思想的核心命题有：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致良知，其良知之学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了莫大影响。阳明心学的思想总体上说是强调道德实践，在他看来，道德自觉不需要到外面去寻找，人具有先验的道德知识，因而所谓为学功夫，关键在依道德意识而践行之。为了实现这一点，他早年提出知行本体、知行合一，认为在本体的意义上，“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这个意义下，知识不付诸实践就不能算做“知”。从历史的角度看，王守仁以道德实践为思想的生长点这一特征，不仅使他自身为人与为学双向圆融，而且也使儒家心性之学达到了实践与思辨的高度统一；而其本体与境界的一致，不仅使儒学显现了强烈的实践品格与丰富的形上智慧，而且也为儒家哲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形上地基。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王守仁也是孟子以来儒家心性之学的集大成者。1525年（嘉靖四年），南大吉在绍兴任职期间，曾向王阳明讨教为政之学，阳明向其阐述了政在亲民，以及亲民与明德、至善的关系。王阳明记录了这次谈话的内容。王阳明对南大吉谈话的主要精神是：为政的根本在于亲民，亲民则在于明明德；明德与亲民是统一的。阳明不仅论述了为政、亲民与明明德一体的关系，同时指出良知作为道德主体在为政、为学上的重要性。这次谈话使南大吉对王学简易之理豁然明了，南大吉于此年

将其从政办公的地方命名为“亲民堂”，并且解释说“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

1526年（嘉靖五年）南大吉“入觐”之时，因朝廷厌恶王阳明心学，南大吉受到牵连，加之其性格耿正，不愿附和当朝权贵，随被贬黜，从绍兴知府任上罢官回乡。罢官后他仍以弘道为己任，在家乡继续交游讲学。被贬黜期间，南大吉与王阳明人有书信来往，从南大吉来信中阳明看到，他虽有此遭遇，但仍勤勤恳恳，以闻道为喜、问学为事。阳明感叹南大吉真为“朝闻夕死之志者”，并很快复信勉励南大吉，对他大加褒扬和鼓励。阳明在信中指出，面对人生困顿，往往有三种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态度，一种是有超然的心态和境界，能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第二种消极逃避，或玩世不恭，或寄情山水，或溺于嗜好。第三种就是闻道之士，此类士人能体认良知之昭明，廓然于太虚而同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能超然其外。阳明非常欣赏第三种态度，并肯定南大吉的为人学，亦鼓励南大吉将圣人之学发扬光大，谓横渠之后，“有所振发兴起，变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

南大吉与王阳明虽然只是在浙中有短暂的交涉，但却一见如故，相知颇深。二人情感深厚，志同道合，亦师亦友，并且王阳明对南大吉的思想影响深刻，从一定意义上说，南大吉在浙中岁月与王阳明的问学改变了其的学术路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后关学的学术走向。

### 二、南大吉与阳明学的交涉

南大吉是阳明心学在关中最重要的传播者，与阳明学的交涉甚为密切，他师从王阳明，并与同时期的阳明门人有很多交往。

首先，王阳明与南大吉的师生关系始于正德六年，关中大儒冯从吾记载，王阳明为南大吉在京城会试中的主考官，当年殿试南大吉登二甲进士第，王阳明以主座而与其有门生之称。南大吉在任绍兴知府期间，为王阳明辟稽山书院讲学，嘉靖三年，他还曾续刻王阳明的《传习录》。嘉靖五年，南大吉离任绍兴府后经过杭州，王阳明特地前往杭州相送，两人会于杭州的胜果寺，而后南大吉启程回渭南，其间与王阳明有书信往来。南大吉对阳明学的传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王阳明也曾在信中寄语他能通过宣讲心学来振奋关学。

其次，南大吉为官期间躬行实践、勤勤恳恳，执法果敢、行法敦仁，且心系百姓。以正民风为要务。这一点并非凭空而来，与南大吉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息息相关其父渭南公训导新野时便以变化士气为要务，后于秦

村逢南大吉云中慰劳军队归来之时，渭南公更是执南大吉手泣道：“余少年有志，未遂，至皓首，竟学官耳。当天子明圣之朝，而予不得致身臣寮。未逢者，命也。今尔弱冠即得志，为天子东省郎官。尔志也，尔弗往贤前哲希也，唯其贵富巍巍，然则，尔得志，亦奚贵！”南大吉承父遗志，勤官远虑，在了解良知真谛后，更是伤躬励行、忠实实践了王阳明“政学合一”的宗旨，形成了其躬行实践、心学治政的为政功夫路径

### 三、南大吉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吸收

在王阳明“天下万物一体之仁”观点的影响下，南大吉逐渐形成了“合天地万物而一体”的情怀。南大吉将这种情怀践行在成圣的追求上，便有了对“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圣人境界的向往。而在南大吉进一步思索常人何以成圣时，便引出了“道化”“物化”之辩，进而发展为其“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南大吉在信中对好友马西玄详细阐释王阳明致良知之学，认为王阳明之学，天下方疑而非议之，而辄敢笃信而诚服之者，非所以附势而取悦也，非谓其所惑也，非喜其异而然也，而求之，窃有以见夫吾心本如是，道本如是，学本如是，而不可以他求也。可见其对王阳明之信服之情。

南大吉作为北方王门的代表人物，对王阳明也十分信服，因此，他对阳明学吸收比较全面，其一是吸收了阳明学“心”、“良知”等概念，其二是他学习并行了阳明学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其三是他践行了王阳明“亲民之政”的主张，并有所损益。

首先，南大吉对“心”、“良知”概念的理解与王阳明基本一致。王阳明曾说：“良知者，心之本体。”而南大吉也曾在《答贺长洲府书》中解释过“心”与“良知”的概念，“然此等此则具于应壁之心者，其几之初动也。或是或非，或常或不常，应壁之心昭然自知，即所谓莫见莫显者也，即所谓良知。”而在给好友马汝骥的信中，他还阐述了良知与心性、道体之间的关系，“是故纷至遯来，困心，反诸吾身，徵诸吾民，夫然后始见夫是心之良知本一也。……皆是心也，天下之所同也，学所以明此也，仕所以行此也。故吾心于事苟无欺蔽，行之而自觉其是；于物苟无私累，处之而自得其安；则必自以为快矣。吾心既快，求之天下而同然，人心亦一未有不快之者。是故毁誉不能摇，祸福不能休，无入而不自得也。”<sup>1</sup>在《与叶硕庄良器书》中，他说“顾唯气薄而质不美，是以此心不能常跃如也。所幸者吾心之良知自明，故发则即能觉，觉则克治之功自有不容己者。”在《寄秀才行简王秀才懋明书》中，他说自己“独幸此心尚存而良知之在吾心者”，可见他对“心”与“良知”概念的理解与王阳明基本相同。

其次，他以发扬阳明的致良知为宗旨，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他解释了慎独和致良知：依是良知，尊卑、厚薄、有无，不以一毫私意参乎其间，即所谓慎独也，即所谓致良知也。在《寄骆秀才行简王秀才懋明书》中，他说“故夫慎独格物致吾之良知，以求至乎圣人之道者，则一时之荣辱进退、聚散远所能加损者也。”直接表明了自己致良知的途径是慎虫格物。南大吉与王阳明曾有一端对话，尝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王公曰“何过？”先生历数其事。王公曰：“吾言之矣。”先生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却是我言。”先生谢而去。居数日，复自数过加密，来告曰：“与其过后悔改，不若预言无犯为佳也。”

南大吉对于“动客气”“泥旧闻”的警醒和其对“心之所固有”的“吾心之本体自见”的多次强调，无不其对于“良知”更为系统化、深入化的理解。不假外修，不向外求事物之理为何，而是通过反求诸己、明心见性而达到与道体相通的境界，实则走的是内在而超越的路径。于是，心性也好，道体也罢，皆通过作为道德本体的“良知”加以贯通故而只要寻着“良知”发用流行处去行止，其自然是顺应天理道体大化流行的，亦自然明澈事理于心而无所私累。

再次，南大吉吸收了王阳明所言的“亲民之政”，并对如何执政提出了以“圣之良知”为定理、定法的评判标准的新的见解。南大吉曾问政于阳明，阳明回“政在亲民”，并说亲民“在明明德”，而明德“在亲民”，即明德与亲是二而一的关系，“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在得到王阳明的点拨后，南大吉在之后的为政生涯中，均遵循教诲，教化民众，福乡里，马理在为其写墓志铭时，言及“故新建伯阳明王公座主也，定时方知之学，亲民之政。公听从其教，任择丞史馀尚体要，诸凡旧政之不便民者，切罢之，既宪令典而又不屑苛细。劳身以赴时，劬农也；均则以致一，督也；平心以求是，听讼也；先行以作人，典学也；修礼以尽志，宁神也；检身裕财，益下也；明义以遏欲，章极也。”明确指出南大吉为官为政听从了王阳的教诲。而除了遵循王阳明“亲民之政”的教海外，南大吉亦有所发展，他在靖三年写的《杂说二首》中有言：“夫有定理而无定法，有定体而无定用，其圣人之心乎！无定理而有定法，无定体而有定用，其今人之心乎！定理、定体，其即圣心之良知乎！……周公思兼三王，正唯求之于无心焉尔矣。……由是观之夫今之为政者，欲以上追古昔之治，其要在乎知古人所以致治之道，而用之何耳。”这里，他对如何

执政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应以“圣心之良知”为定理、法的评判标准，也确实也这样实践了，在他写给马西玄的信中，他谈及在越中官所做之事，言“唯反之于心苟无愧焉，谁毁谁怨吾心自快也；苟有愧焉，谁誉谁恩吾心自欺也。自快则心快而乐莫大焉，自欺则气馁而忧莫大焉。故某每以自欺是省，自快是期，而未能也。”

对于南大吉，王阳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与南大吉的书信中说：“凡是有道之事，其于慕富贵，忧贫贱，欣戚得丧而取舍爱憎也，若洗目中之尘而拔耳中之楔。其于富贵、贫贱、得丧、爱憎之相值，若飘风浮霭之往来而变化于太虚。

而太虚之体，固常廓然其无碍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几于是乎！是岂有待于物以相胜而去彼取此？激昂于一时意气者所能强？而声音笑貌以为之乎？元善自爱！元善自爱！”体现了他对南大吉由衷的赞叹，而后，他又在信中寄语南大吉回乡后在关中通过宣讲心学来振奋关学，也可见其对南大吉学问之肯定。

### 结语

南大吉是北方王门的代表人物，信服、从学于王阳明，还为王阳明开辟稽山书院讲学并作为学者表率，为王阳明刻录《传习录》以助阳明学之发展，可见他与王阳明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他作为阳明门生，自然与其他阳明学者有所往来，因此在同时期关中儒者中以他与阳明学之间的交涉为最多。

自然，作为在关中传播阳明学的第一人，他的学问大多是对王阳明所教授之学的理解和阐发，因此，他学习、吸收了阳明学“心”“良知”概念，践行“致良”与“知行合一”之说，还在为官中践行并增益了“亲民之政”之说。

南大吉与阳明学的交涉体现了他这一时期关中学者的学术处境，他对阳明学吸收也体现了当下当时理学内部的流变以及阳明学的崛起之势头。

### 参考文献

- [1][2]《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3]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4]冯从吾.《关学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

作者简介：耿峰，1979年出生，男，汉族，陕西渭南人，硕士研究生，渭南市瑞泉中学历史教师，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学、中国思想史。